

白城

档案文物

带你穿越历史长河，

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 {十三}

古代的秤砣原来长这样

在白城市博物馆中，一个金代铁权十分引人注目，它是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底直径为5.02厘米。

“权”，即“秤砣”，是中国传统度量衡器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承载着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大量信息。它最早出现于东周，汉代称权为“累”，民间呼之为“公道老儿”。

一枚铁权，可能无法称量出世间所有公道，但却制定出了人们共同遵守的“斤两”标准。

古人称重时，需先将待称量的物品挂在秤杆（衡）一端的挂钩或绳索上；然后，手提秤杆中间的提纽，移动铁权，使秤杆保持平衡；当秤杆平衡时，根据秤杆上的刻度及秤砣所在位置，便可读出所称物品重量。“权衡”一词也由此而来。

历代的“权”材质多样，有铜、铁、陶、瓷、石等；造型丰富，有长方形、银锭形、方胜形、圆柱形、扁圆形、葫芦形、圆形和鼓形，还有蚊虻兽、钱鼠、猴、羊和蟾等动物造型。

“权”是如何制作的？

根据研究资料表明，古代劳动人民通过世代相传的长期生产实践，创造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铸造工艺，我国的金属铸造锻件生产，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其中以泥范、铁范和熔模铸造最重要，称为古代三大铸造技术。

而白城市博物馆的这件金代铁权，推测应由熔模铸造即浇筑法进行制作：先用调好的油蜡制模，然后在外面敷上泥料制型，阴干后加热化往蜡模，进窑焙烧，烧成后即可趁热浇注。

铁权除了称重，还可以充当吉祥物。相传民间搬家时，先搬过去一个秤砣，造屋上梁时，将它悬挂于梁上，寓意“称心如意”；压幔帐四角也用它，使幔帐熨贴、平整。也有人将铁权用作冥器，作为权力象征，以显示死者生时地位。

古人在保存铁权时也十分小心，需将它放在适宜的温度环境下，保持干燥，防止腐蚀，避免碰撞，清洁处理，合适包装，定期检查，保证它不生锈、不变质、不影响使用。

白城市博物馆这件看似平凡的铁权，见证了先人们无数次的交易，作过不计其数的衡量。它的身上，铭刻着岁月的痕迹。或许曾被无数双粗糙的手紧握，感受过生活的艰辛与希望；或许曾在风雨中渐渐锈蚀，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使命。

千年岁月流转，世间事翻天覆地的，但铁权那不变的形状和沉甸甸的分量，依然在诉说着人类对公平与秩序的永恒追求。



图为民国锡质龙凤饰酒壶

琼浆玉液中的百年光影

有的人十分好奇，清代和民国时期，宴会上人们都用什么装酒？

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民国锡质龙凤饰酒壶能够解答人们的这个问题，它的口径为5厘米、腹径为8.2厘米，壶身有龙凤纹饰，造型奇特，古色古香。

龙，被视为神秘而强大的存在，代表着英勇、权威和统治力；凤，被视为百鸟之王，象征着女性的柔美和高贵，代表着幸福、美满和吉祥如意。龙纹和凤纹同时出现在酒壶上，寓意龙凤呈祥、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它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希冀。

除了龙凤纹饰外，民国锡质酒壶上还刻有花卉纹饰、神话传说人物纹饰、历史故事人物纹饰、动物纹饰、吉祥文字纹饰、几何纹饰和山水纹饰等多种纹饰。

据了解，锡器的使用历史十分悠久，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便发现并使用锡。周朝时，锡器的使用已十分普遍。有资料显示，锡制酒具始见于明代，普及于清代到民国。明清时期，锡箔业兴起，不少生活用具开始用锡制作，因其不透水、不受潮、易密封的特点，可作盛酒具，也可作温酒器。清代至民国，锡质酒壶的铸造量非常大，在民间很受欢迎，是家庭必备的酒具。

锡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能够较好地保持酒的品质，不易与酒发生化学反应，保证酒的原味；锡相对较软，易于加工成各种形状和款式的酒壶，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审美和使用需求；相较于其他金属材质，锡的成本较为适中，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

在宴请和聚会等社交场合中，锡质酒壶作为饮酒的器具，能够体现主人的热情和对宾客的尊重；精美的锡质酒壶可以作为家居装饰品，增添文化氛围，还常被作为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在外出劳作或旅行时，还方便携带酒水，以解饥渴。

锡质酒壶，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百年前，它或许诞生于一位手艺精湛的工匠之手，每一道锤痕、每一处焊接，每一道刻饰，都倾注着匠人的心血与期望。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锡质酒壶可能是富贵人家宴会上的华丽点缀，也可能是普通百姓家中为数不多的珍贵物件，承载着生活的艰辛与温馨。

现代社会，随着新材料和新潮流的涌现，锡质酒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我们仿佛能从这件酒壶中看到百年光影。锡质酒壶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湘绣四条屏文化探幽

●张惠



四条屏湘绣之凤凰与牡丹

《红楼梦》中的苏绣“慧纹”与美食“茄鲞”并称双璧。但是，“慧纹”毕竟只是纸上描述。近日所见四条屏湘绣精品，可能为近代制作，让我想起了“慧纹”。其中除了本土花鸟，还包括海外风物。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提到，贾母的珍藏品中有十六幅“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瓔珞。贾母见多识广，品位高雅，她收藏的“霞影纱”，连出自“专管各国进朝贡奉”的王家的王熙凤都没见过。贾母欣赏音乐，要求“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她带着家人中秋赏月时吩咐，“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因此，她所钟爱的这幅瓔珞更是

迥非凡品。“原来绣这瓔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因他亦是书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书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并非市卖之物……他不仗此技获利，所以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贵之家，无此物者甚多，当今便称为‘慧绣’。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仿其针迹，愚人获利。偏这慧娘命天，十八岁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纵有一两件，皆珍藏不用。”学识文才皆高的翰林学士们甚至觉得，“慧绣”不足以道其精绝，因此特意命名为“纹”：“有那一千翰林文魔先生们，因深惜‘慧绣’之佳，便说这‘绣’字不能尽其妙，这样笔迹说一‘绣’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议了，将‘绣’字便隐去，换了一个‘纹’字，所以如今都称为‘慧纹’。若有一件真‘慧纹’之物，价则无限。”

这四条屏湘绣将中国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书法、金石艺术融为一体。每幅都是精心搭配的花鸟图，之间形成呼应，上面所绣诗句也并非拈人牙慧，而是紧扣画意独创。四条屏未标次序，然而，根据凤为皇后专属，明清文官补子一品为仙鹤，三品为孔雀，似可将其以凤凰、仙鹤、孔雀、雄鹰为序。第一幅为凤凰与牡丹：“彩凤双栖夸艳福 名花竟放喜连枝”，此诗虽表面未写牡丹，实际用的却是李白诗句的典故。《杨妃外传》称：“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唐明皇命李白赋诗称赞杨贵妃之美，李白写下著名的三首《清平调》，其中之一分别以“名花”和“倾国”代称牡丹和杨贵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第二幅为

仙鹤与月季：“鹤舞青松同不老 花荣四季得长春”。其中以“四季”点月季，又与“吉”谐音，而且仙鹤长寿，月季长春，可谓相得益彰。第三幅为孔雀与大丽花：“菊迎九秋花更丽 文呈五色雀屏开”。此诗用的是唐高祖李渊“雀屏中选”的典故，窦毅命求婚者每人射两箭，谁能射中屏上孔雀双眼，就把女儿许配给谁。《旧唐书·高祖窦皇后传》：“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第四幅为雄鹰与凌霄：“雄鹰得意冲霄汉 浩气凌空展壮猷”，其中用嵌字格嵌入“凌霄”，又与雄鹰搏击长空，气冲霄汉相辅相成。每幅题诗后用印章形式绣“湘绣”作为落款。

《红楼梦》“慧纹”所绣为草书，四幅湘绣所绣诗句为行书。“慧纹”优长之处在于“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此湘绣也绣得勾踢、转折、轻重、连断都和书写一般。“慧纹”的主人慧娘本身精于书画，而此湘绣的绣娘不知来历；从“大红纱透绣”判断，“慧纹”为双面绣，而此湘绣为单面绣。从刺绣工艺上看，此湘绣不如“慧纹”，但是，“慧纹”只绣了折枝花卉，湘绣还绣有珍禽；“慧纹”上的诗词是古人旧句，湘绣上的诗句是扣合画意的原创。

该四条屏绣品还体现了中西交汇的特点。其中既有中国传统花鸟，又有来自海外的珍禽异卉。花卉之中，第一、二、四幅的牡丹、月季、凌霄都产自中国本土。汉代即有牡丹之名。北

宋名儒周敦颐“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的说法几乎成为定论。在吉祥画中，常用牡丹喻富贵。月季也起源于中国，因春夏秋冬开花不断故得名“四季花”。凌霄花更是在《诗经》中就已经被咏入歌，“苕之华，芸其黄矣”“苕之华，其叶青青”。

然而，第三幅中的花卉却原产墨西哥，后来相继引种至世界各地，于19世纪末进入我国。它是菊科大丽花属植物，别名“大丽菊”“地瓜花”，国人在引进时取名“大丽花”，既谐音“大利”，又概言其品种繁多，艳丽多姿。因此，这四条屏绣品在诗中巧妙地嵌入了四个花名“名花(牡丹)”“四季(月季)”“丽菊”和“凌霄”，和四禽构成了富贵长春、吉利凌云的佳谶。

第三幅中的珍禽孔雀也来自域外。初听令人不解，孔雀不是源于中国本土吗？东汉杨孚《异物志》中即记载：“孔雀，其大如大雁而足高。毛皆有斑彩，捕而蓄之，拍手即舞。”唐代韩愈《孔雀》诗描述：“翠角高独耸，金环焕相差。”然而，中国独有品种是“绿孔雀”，从宋到清绘画中一般所表现的都是绿孔雀，如北宋崔白《枇杷孔雀图轴》，晚清吴昌硕《芍药孔雀图》、晚清任伯年《牡丹孔雀图》等。偶然绘制“蓝孔雀”还是因其罕见，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哈密进贡孔雀，乾隆帝命画家绘之，并作《孔雀开屏》御制诗题上，七月十二日《活计档·如意馆》记录：“著郎世宁画开屏孔雀大画一轴，补景著方棕、金廷标合笔，用白绢。”该《孔雀开屏图》长328厘米，宽282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的就是尾屏一开一敛的两只蓝孔雀。

绿孔雀和蓝孔雀差异巨大，在珍稀程度上，绿孔雀是中国的原生孔雀，

明清三品文官官袍上的补子是绿孔雀，清代官帽上的花翎也来自绿孔雀。但它现在仅存于云南省，种群数量不足500只，200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全球性濒危（EN）物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中被列入附录Ⅱ，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极度濒危物种，比大熊猫还要稀少。蓝孔雀又名印度孔雀，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大约在汉晋之际传入我国西域，数量众多，《魏书》载：“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鶩。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蓝孔雀种群数量稳定，被评为“无危”物种。

两者在外貌上也有较大差异。绿孔雀是体型最大的雉科动物，鸣声高而洪亮，羽冠为紧密高挺的簇状，脸颊为鲜黄色，胸颈部的羽毛呈鱼鳞状故又称“龙鸟”，毛色为金属绿色，雌鸟除了没有华丽的尾屏外，其余各处几乎和雄鸟一样华丽。蓝孔雀体型相对矮小，叫声似老鸹，羽冠为散开的扇状，脸颊为白色，胸颈部的羽毛呈丝状，毛色为金属蓝色，雌鸟全身灰褐色。

第三幅绣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绣的是一只混血孔雀。冠、胸颈为蓝孔雀，翅、屏为绿孔雀，为何会如此？因为绿孔雀和蓝孔雀虽然外形、性情相差巨大，但没有生殖隔离，两者生下的后代也有生育能力。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伯丁夫人（Mrs Spalding）首次尝试将蓝绿两种孔雀杂交，所得混血种因之得名为“斯伯丁孔雀”（Spalding peafowl）。

该绣品可能诞生于何时？其中的大丽花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种植；“斯伯丁孔雀”的创造者斯伯丁夫人的生卒年是1882—1959；第一



四条屏湘绣之孔雀与大丽花

幅题诗“彩凤双栖夸艳福 名花竟放喜连枝”。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福”也是平声，似乎平仄失对了，但“福”实际上是入声字，因此平仄无差。然而，1913年由读音统一会审定，1919年以《国音字典》的形式正式公布的老国音，在1932年被新国音取代，标志着入声在标准语中的消失。

综合来看，该绣品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问世。“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在这个时期正处于鼎盛期。1935年，《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绣品”一节中，湘绣就占了一半的篇幅。湖南并非沿海地区，却在绣品中表现了海外珍禽名花，既可见中西交流的繁盛，更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和日新月异。